

虹桥灯火映三川

童建军



大庆路桥夜景

周口位于沙河、颍河、贾鲁河三河交汇处,河口北侧的贾鲁河上有一座二板桥,老周口八景之一“虹桥灯火”即在此附近。

周口因水而生,除了舟楫可渡,遇水架桥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更是功德之事。

相传周口中心城区川汇区的造桥历史起于明崇祯年间,原本在二板桥的南边建有大板桥,砖墩木面,清乾隆初年夏秋暴雨连旬,贾鲁河决溢,此桥被洪水冲毁。清乾隆二十七年,周家口人孔兴铤会同士绅与商贾大户捐资兴建鸿济桥,即二板桥,20年后又毁于洪水,并且嘉靖、光绪年间又历经重建和冲毁。民国十一年,周口孔继文主持,再次集资重建鸿济桥,全长60米,宽7米,6孔,中4孔红石桥墩,两端边孔木排架式,木质桥面,桥面中间铺设两条供铁轮大车行驶的槽形铸铁轨道,桥西建有门楼,上悬“鸿济桥”和“西联秦晋”二匾。(参见徐长磊《周口中心城区的桥》)

从民国22年《淮阳县志》周家口图和周口市志的记载看,直到1935年沙颍河上的“周口桥”建起之前,二

板桥是老周家口城区里的唯一一座桥梁,又是联系贾鲁河东西两岸的必经通道,虽多次被毁,但再毁再建,足见个中情衷。关于二板桥的历史传说,有一些很有趣的版本,广为流传的是,明清之际,二板桥附近店肆林立,桥下舟船簇集,非常热闹,暮色降临,长桥卧波,灯火灿烂,宛如彩虹,直至深夜,是谓“虹桥灯火”。

桥梁的建造不仅反映着道路和交通方式的变化,而且承载着城市的发展历史。就现代意义的桥梁而言,周口沙颍河上的第一座桥梁是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周口桥。当时为民国时期,沙颍河两岸民众主要还靠渡船摆渡过河,1932年,河南省建设厅派人到周口勘察,拟定建桥计划,1934年列省重点工程,由赵国华工程师(河南人,曾留学日本)设计,并全额拨付标的金额开工建设。由于位于桥北岸的5号桥墩打桩时遇到坚硬砂浆层,承建方同成公司要求加价,周口商会从地方筹集5000银元,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历时1年零7个月,于1935年12月完工。当时,一位德国摄影师拍下了一幅周口桥新落成不久的照片,桥上有几位官员视

察,桥下依然桅杆高耸,舟船相接。另有一幅“鸿昌醋房”的苏家后人从台湾寄回的照片,拍于1937年,照片上有漯河开往周口的小汽轮从沙颍河桥下驶出,依稀可见航运兴衰的旧影。

沙颍河上的这座周口桥横跨100多米,因为采取了现代造桥技术,时人称之为“洋桥”,1950年的《周口市街详图》上即此标注。“洋桥”经历过日军的轰炸和周口解放的炮火,总体坚固,新中国成立后桥头上还曾建起过跃进门和跃进塔。历经50多年的岁月,由于桥体破损、桥面过窄,虽经扩建但行洪能力依然不足,1987年拆除老桥,改建新桥,按河口宽180米设计,5孔,工程总长402米,桥身长180米,并且北部有立交旱桥,1989年9月竣工通车。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政府将流经周口西寨古城的沙颍河选为保障周口工农业用水的蓄水池,计划建设大型的沙颍河水利枢纽工程周口大坝,规划于1958年,1959年9月动工兴建,1961年10月,因资金、物资匮乏停建。耽搁10多年后,1974年,周口地委、周口地区行署决定对其续

建,并要求参建技术人员设计出全国一流的拦河闸工程。经过精心设计施工,周口大坝(桥)于1975年最终建成,成为当时全省第一样板闸,并成了周口地标性的建筑。这一时期,原建设路贾鲁河桥、八一路胜利桥、大庆路桥等先后建成投用,城市的交通和市民的出行更加快捷便利。

2000年周口撤地设市以后,周口的桥梁建设又迎来了一个高光时代,相继拆旧建新建起了大庆路沙颍河桥、建设路贾鲁河桥、八一路沙颍河桥,新建成了龙源大道桥、周口大道桥、武盛大道桥,近期正在抓紧建设的还有中原路桥、七一路东延跨沙颍河桥、周口新北环贾鲁河桥等,“明月照古城”“扬帆起航”“凯旋”……,在建设“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中原港城的语境下,桥不仅被重新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造桥的技术和桥的方式也由梁式桥到斜拉桥、下承式拱桥、悬索桥等,更加多种多样,加之周口中心城区7条水系治理新建改建的一座座兼顾功能性与景观性的桥梁,周口桥梁博物馆的美名呼之欲出。

有人说,桥是跨越障碍的通道,又是“衔接或过渡的时间、空间或手段”。它维系着城市的往来运转,又承载着历史的印痕和进步、记录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间沧桑。桥梁的建设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解决了基本的通行功能之后,还融入了工匠技艺和丰富的地域文化,凝结着地方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规划建设者的心血和汗水,因此,桥总存储着记忆伴着风景,很多也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周口自古河道纵横,城市因水而兴,“虹桥灯火”的老景致应运而生。如今,周口正努力再造“满城文化半城水”的城市荣光,更不可能少了桥的多姿多彩,“虹桥灯火”自然也会随着水系的治理得以重现和延伸。对于现代的周口人来说,周口二板桥历经变化,又待新的规划建设,似乎已难觅当年的繁华踪影,但是,每一个周口人,或者到过周口,以及对周口有所了解的人们,也许是中州路桥上正月十五的亮彩铁花,也许是一座桥架南北的周口大坝,也许是八一路桥上放眼的烟波杨柳,也许是大庆路桥洁白而壮丽的索道独塔……总会有桥的身影拨动着关于周口记忆的琴弦。特别是伴着周口夜景照明工程的实施,当璀璨的灯火点亮周口三川,当虹桥的影子荡漾在水波之上,我们难道不能说,“虹桥灯火”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也更在我们的心里吗!

以求真之心 写至真之人

——评张恩岭《张伯驹传》

于华

读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19年第二版《张伯驹传》,惊喜、感动、骄傲、自豪之情,犹如阵阵热浪澎湃于胸。

《用心追求真实》是该书作者张恩岭《自序》的题目,也是他为张伯驹立传的原则。历经多年探访求索,终以孜孜求真之心拂去悠悠岁月的积尘,洗净传奇戏说的迷彩,还原了张伯驹这样一位集诗词家、文物收藏家、京剧艺术家于一身的本真面容,展现出这样一位文化巨星为坚守传统文化不惜身家性命的至真个性。让我们十分惊喜地看到——可敬可爱的张伯驹先生手持拐杖,披着晚霞的余晖,从碧绿丛林的历史深处缓缓走来……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

《张伯驹传》就是这样一部书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信的书,书中的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位终生坚守并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信的人。我们可爱的祖国,曾经拥有张伯驹这样一位“至真之人”,这怎能不让我们为之骄傲?当年的张伯驹,当今以“求真之心”为这位“至真之人”立传的张恩岭,都是我们可爱家乡河南周口项城人,这又怎能不让我们为之自豪?

当然,最让人感动不已的,还是作者笔下这位“至真之人”的真实人生。

全书共十大章节——

第一章《渺渺浮生——“丛碧”》,“世出名门”“天资初露”“解甲从商”讲述了张伯驹从1898年出生到1925年的成长经历,以诸多史实回答了张伯驹为什么视权力、金钱如粪土?为什么对自己任职的“师参谋”和“盐业银行总稽核”不屑一顾?为什么能如此洒脱地终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其一,表叔袁世凯总统的称帝闹剧和父亲张镇芳(曾任河南督军)的宦海沉浮,使他看清了官场的争斗与险恶。其二,其优裕的社会及家庭背景让高官、金钱在他眼里都成了伸手可得的俗物,“凡难所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故弃之不惜。

作为人物传记,唯有写好典型环境的真实,写好社会整体性本质源头的真实,才能写好典型人物典型个性的真实。

第二章《文采风流佳公子》,澄清了两大史实。一是当年与张伯驹交往甚密的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桐、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为何被人谓之“民国四公子”?他们四人又怎样于历史风云激荡中各自显露出爱国情怀、高尚人品和卓越的艺术才华,才促使这一称谓从贬义到褒义的转化?在“公子岁月”一节里,既有生动详实的论述,又有鞭辟入里的评析:“首先,他们都出身显赫,却都不以家世为炫耀。贩夫走卒、折节论交;面对达官显贵,反而等闲视之。其次,最让他们有人缘的,就是其保持着性情的纯真,天性的直率。虽然有权有势,却不欺男霸女、强买强卖……”

二是关于张伯驹与潘素的婚恋。不少读者在读《张伯驹传》之前都读过有关张伯驹与潘素“浪漫爱情”的诸多

版本,而津津乐道的是青楼美女弹奏的琵琶曲怎样才予忤然心动,才子又怎样吟诗填词示爱定情,却又因名花有主(竟然还是国军中将)导致凶险横生,又怎样在友人侠士协助下深夜救美于囚室……全然庸俗电视剧式的套路与桥段。然而,经张恩岭多方查访考证,事实真相则是:潘素并非出身青楼,“就像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一样”,只以其文艺特长在上海书场表演过弹唱。而张伯驹与潘素的相见也也并不“浪漫”,据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回忆,“我外公和外婆”的“相识”,是“父辈的一个世交,叫孙履安,通过他的介绍,两个人相识,最后在苏州完婚的”。若依此真相,写出的故事当然既不浪漫也不惊险,没啥趣味。但“传记”岂能为了“趣味”沦为戏说式的“传奇”?正如张恩岭在《自序》中所言:“一个故事的价值依赖于它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那就分文不值。”尽管其婚恋真实故事并不浪漫,但婚后的张伯驹却把一生的真心真爱完全交付给潘素一人。后来虽遇一舞女热烈追求,“但他心系潘素,痴情不悔,坚决逃脱了诱惑,夫妻俩鹣鲽情深,同游共息,在以后的数十年岁月里虽经历风雨,却始终不离不弃”。

第三、四、五章,则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张伯驹对于京剧艺术、诗词写作、文物收藏这三大爱好的真心真爱。

对于京剧艺术,张伯驹经历了由爱看到爱演,又由爱演、善演到爱研,亦即由“票友”到“拜师”,又由“表演”到“成立学会、著书办刊”步步登高的几大阶段。他拜“使京剧老生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第一人”的余叔岩为师,学艺长达10年。他先后多次与余叔岩、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同

台演出并深受好评。1931年,张伯驹联合梅兰芳等京剧名流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会”。编辑出版《戏剧丛刊》等刊物,又与余叔岩合写了《京剧音韵》一书。为此,余、张二人被学者尊奉为“京剧音韵理论的首创者和奠基人”。著名学者冯其庸在《旷世奇人张伯驹》一文中也说:“振兴京剧,他是有卓越贡献的。”

如前所言,写好典型环境的真实才能写好典型人物典型个性的真实。论及张伯驹的诗词,第四章第一节开篇就说:“张伯驹成长的家庭,既是官僚,又是诗礼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张镇芳就是一位进士出身的诗人。”长大成人的张伯驹退出军界之后,“便处于投闲置散的环境里,他那愤世嫉俗的思想无处发泄,恰好遇上了对诗词艺术的热爱,便找到了托物寄情的方式”。在这样典型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里,一个具有典型个性的典型诗人也就“天然”地成为“出水芙蓉”了!

书中评说:张伯驹词的风格当属“婉约派”。尤其可贵的是,伯驹词更多地浸淫了正宗词的诸律与柔美,品致之高,绝无俗气,真正称得上“词人之词”。从词作年代来看,其词早年以湖山清赏、抒发欢快之情者多,取景优美,用笔宕折,情感细腻,自然超逸。晚年则多属个人情事回忆、透视人生,深于感慨,情感深邃。例如,同是写“落花”,其早年写的《临江仙》有“山光微雨外,人影落花中”句;晚年写的《浣溪沙》则有“怕到春来易断魂,满庭芳草立黄昏。落花无语归离人”句。为此,著名学者冯其庸赞叹说:“只要你真正体会到张老在北国冰天雪地的苦难情景,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眼泪的。”(未完待续)

随着网络发展日新月异,文旅扶贫越来越向“互联网+”借力。7月10日,“今夕荷夕 梦圆水城——2020 淮阳赏荷旅游月”盛大开幕,“网红”主播助力淮阳文旅扶贫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本次活动由淮阳区文改委、文旅局主办,淮阳读书会、倪莉工作室承办,18家农村合作社、非遗项目传承和当地文创产品商家参与。

活动依托淮阳赏荷旅游月,体现大美龙湖和太昊陵等文旅景点价值,将地方美景、特色好物、助农产品变成价值支点,通过夜市、地摊、“网红”直播等多种热门的文旅体验引流拉客,引导外地游客和网民深度参与,激活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带动地方发展,群众增收。同时,通过活动吸引更多游客参与传播,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当天,参与活动的文旅助农产品可谓琳琅满目,很多产品既富有创意又有实用价值。有淮阳非遗传承的泥泥狗、布老虎、中药香包、面塑、毛笔,也有特色美食鸡内金焦馍、永海砂糖馅、徐记压馍馍、老岳家石磨香油、陈州酱菜、羲都牛肉和远销海外的瑞能服帽,更有多家农村扶贫合作社带来的石磨黑麦粉、黑花生、瓜果等绿色食品,当地土特产。

2020年,不仅是淮阳撤县设区之年,更是扶贫攻坚工作收官之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文化旅游业的严重冲击,全区上下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文化和旅游扶贫,多措并举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扶贫优势,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贡献文旅力量。7月10日晚八点,淮阳一年一度的赏荷旅游月在万众期待中拉开帷幕。比起以往,今年的赏荷旅游月可谓亮点纷呈、精彩纷呈。开幕式筹备期间,“直播带货网红”——淮阳区委常委、副区长刘大明和区文旅局局长于树林诚邀各路“网红”主播在赏荷旅游月期间打卡淮阳,助力当地文旅扶贫。

“网红”区长的邀请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各路“网红”主播、“网络大V”纷纷关注,短短几天内活动组委会就收到上百名“网红”主播的申请。经过甄选,当天开幕式现场共邀请了30多位抖音、快手等平台的才艺主播、知名“网红”作为特邀嘉宾。从下午6点开始,身着汉服的美女主播,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就面对直播镜头和现场观众,对产品进行试用、试吃,并穿插各种才艺表演和开幕式盛况展示。丰富的当地特色产品和详细的产品介绍、才艺展示和美景,不仅吸引了现场诸多游客的围观、拍摄,直播间也吸引了大量粉丝围观。现场更是火爆,参与开幕式的观众争先恐后购买心仪的特色产品,淮阳区委委书记马明超还和与会嘉宾兴致勃勃地逛夜市,并和每位博主亲切交谈。在主播的大力推荐下,马明超购买了香包送给现场的观众和嘉宾,带头支持文旅扶贫工作。

“网红”直播让文旅宣传鲜活而接地气,由其生产的短视频频具有自发性、亲近性、可感性,比单纯图文或长视频更具表现力和互动性。众多美女主播衣袂翩翩,不仅颜值高而且口齿伶俐,介绍起当地扶贫产品更是不遗余力,围观者直呼“仙女团来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和主播们精彩的表现深深打动了直播间的粉丝,粉丝们一再高呼淮阳“真香”,好想去看看。据不完全统计,当日从下午6点开始至晚上11点直播结束,5个小时内有关淮阳赏荷旅游月开幕式的直播,视频点击量已突破千万,线上线下的销售收入达到百万元以上。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短视频以挟技术赋能之力,融通消费与市场的梗阻,打通了商家和消费者的连接渠道,以其特有的呈现方式和传播特点,与文旅扶贫之需内在契合。淮阳在赏荷旅游月期间推出“网红”直播助力淮阳文旅扶贫活动,借助抖音、快手等平台,充分印证了文旅扶贫工作的维度可以更广、效果可以更好。

从光武帝说邓禹

杨箴廉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同时,天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盗贼蜂起,民不聊生,纷纷起义讨莽。此时,南阳李通鼓动刘秀、刘■兄弟等在湖北春阳(今湖北秦阳县境)起兵。刘秀遭莽军追杀,至骨头家,匿何氏家。何以子饰刘秀衣冠代死,刘秀夜得遁。后被莽军发觉,返兵屠何氏满门。刘秀继位(为光武)收葬残骨,为骨头家。骨头家位于村东侧,呈方形台地,原高约7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家上建光武帝庙。岁月沧桑,几经修复。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知县王钦造重修,有大殿三间、卷棚三间。家四周筑有土寨墙,家上亦修有土寨。清咸丰年间,骨头家村文生黄峨峰倡捐修寨,易名“忠义家”。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修砖寨,开东西二门,家前建火神庙、奶奶殿及东西配房。家上大殿屋中塑有光武帝像,两侧亦塑有四大金剛像。从右至左,依次是邓禹、姚期、岑彭、马武。邓禹乃东汉初军事家,官至大司徒、邓侯,居二十八宿(袖)之首。

清末至民国时期,盗贼蜂起,土匪横行,到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据说,有股土匪,常去骨头家寨借粮,当他们派出探子踩盘时,老远就看到骨头家寨墙上,旌旗飘扬、甲士林立,邓禹、姚期等四大将带领兵士轮值守寨,以保地方平安。土匪惮于光武帝威名,再也不敢算计骨头家寨了,之后,光武帝香火更加旺盛。正所谓,受一方烟火,保一方太平。

笔者祖居大凡村,距骨头家约一华里,小时常随老人一起烧香祭庙,祈求平安。常听老人说: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家是南顿邓湾人(今属项城市)。邓湾在谷河旁,民谣云:谷河上八里出邓禹,下八里出娘娘(曹窰曹娘娘)。事虽可信,终属传言,怎足为凭?后见项城市政协编《守望文脉》下册,项城历史文化要览,知邓湾位于南顿东南2公里处,地处谷河侧,汉时有邓姓人居此而得名,邓禹死后,其墓便筑在邓湾村北面的谷河侧,墓前还立有三座碑。可惜1955年挖河,墓与碑均被毁,追悔莫及。关于邓禹墓也众说纷纭,有说是埋骨处,也有说是衣冠冢。但不论是衣冠冢或是埋骨处,既然邓禹死后,被葬在邓湾,就一定有其重要原因。

史载,光武帝刘秀的父亲刘钦,曾在南顿当过县令,所以刘秀将南顿作为第二故乡(有说刘秀即生在南顿县衙后院),邓禹和刘秀小时候是同学,又一生为刘秀所倚重。为报答刘秀的知遇之恩,邓禹在生前就立誓,死后葬在南顿,为光武帝守护第二故乡。南顿附近有个邓湾,

是邓氏族人居住的地方,邓禹原本就是邓湾人,所以死后便葬在了邓湾。另一种说法是:邓禹为替光武帝守护第二故乡南顿,死后便葬在了南顿附近的一块风水宝地,谷河转弯处。葬后,邓禹的子孙为给邓禹守墓,便分派了一支嫡亲,迁居墓旁,之后,人丁兴旺,繁衍日盛,自然形成了一处大村庄,因全村人都姓邓,而且村居河湾处,所以便命名为邓湾,即是后来的邓湾村。若照此说法,则邓湾村民理应是邓禹的后人。

关于邓禹的出生地,史家早有定论:邓禹(公元2年~58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东汉初著名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官大司徒、邓侯,改封高密侯,进太傅,元平元年去世,谥号元侯。邓禹年轻时与刘秀同学,更始元年刘秀巡行河北,邓禹前往追随,提出“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方略,被刘秀称之为萧何。况且,东汉时南阳郡邓氏,家族显赫,世代将相,又有谱牒可寻,是绝对错不了的。显然,第一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若照第二种说法,邓湾村的村民自然是邓禹的后代了,此说更合乎情理,比较真实可信。据载,邓禹有十三个儿子,《后汉书》载长子邓震、次子邓袭、三子邓珍、六子邓训及少子邓鸿。其他儿子从地方志上或可查出,但不知为邓禹守墓的是他哪个儿子,或是近支。历史也无记载,笔者寡闻,又不敢主观臆断,不过邓禹葬后,墓前立有三座碑,照理,像这样大的事情,碑文中应有详细记载。可惜的是,墓与碑均被毁,此事又陷入谜团,无从考证。如果邓湾村的村民保存有谱牒,从谱牒中也可查出详情。

据知情者透露,项城原属商丘地区,1955年挖河时,商丘地区文物部门来人,将邓禹墓、墓碑及碑文,拍成照片,带回商丘,建档保存。揆情度理,既然邓禹墓址在项城邓湾,那么,有关邓禹墓的宝贵资料,项城理应保存一份。那样的话,邓禹墓是邓禹的衣冠冢,还是埋骨处,以及邓禹与邓湾邓氏族人的关系,自会水落石出、大白于世。不过,这些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禹作为东汉初的大臣,出生入死辅助刘秀建立东汉,又主动提出死后葬在南顿,为光武帝守护第二故乡,邓禹的后代,在邓禹死后,从南阳迁居南顿,协助邓禹完成遗愿,也为光武帝守护第二故乡。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邓禹更不愧为一代良臣,流芳千古、光照后世,为邓禹守墓的邓氏族人,也可称得上盛世良民了。

淮阳文旅扶贫如火如荼

倪莉